

天门籍华侨述略

萧致治 吴守一 彭鲜旗

天门是湖北省著名的侨乡。据统计,全县有旅居国外的华侨、外籍华人 2,400 户, 47,462 人, 散居于 36 个国家。归侨和侨眷 1,978 户, 10,661 人。除闽粤外, 天门是出国华侨较多的地方。

粤闽两省地处沿海, 和东南亚各地早有往来, 当地人民纷纷侨迁国外或被骗出国, 容易理解。湖北位于全国腹心, 天门又居湖北之中, 出国者为何如此之多? 现状如何? 值得深入探讨。

一 出国原因

今日的天门, 河渠纵横, 交通便利, 土地肥沃, 物产丰富, 是人民的安乡乐土; 可是, 在旧社会, 天门却是饥民载道、哀鸿遍野的苦地方。人们为了生存, 不得不辗转迁徙, 逃亡异乡。当前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天门籍华侨和华人, 大多是那时侨迁国外的。考察天门籍华人出国原因, 主要有下列因素:

首先是和水灾有密切的关系。天门位于江汉平原, 汉水从西北入境, 和支流牛蹄河、府河皆并行向东, 经过全县腹部地区。这三条河常年闹水灾, 有如三条巨龙, 搅得全县人民不得安宁。据道光时修纂的《天门县志》记载: “邑为襄河(即汉水)中腹, ……河身沙淤, 沔阳湖地淤筑成垸, 夏秋水涨, 来势汹涌, 去流壅塞, 则腹胀为灾”, “襄河支流自牛蹄口入, 至脉旺咀出, 上宽下狭, 壅滞为灾。故两岸堤垸有六年七溃者, 有三年四溃者, 有两年三溃者, 一年两溃者。”每次溃堤, 莫不给人民造成无穷灾难。如:

康熙元年: “汉水溢, 城上可行舟, 居民溺死无数。”

乾隆二十五年: “汉溢数月, 冬大饥, 民采树皮为食。”

嘉庆十年: 县内东西两堤皆溃, “水入城, 深二丈许, 女墙行舟, 衙署、民房、城垣、仓廩均有倒塌。”(以上均据《天门县志》卷十五)。

光绪二十三年: “天门、汉川被水灾民数十万, 不惟无粮可食、无田可耕, 抑且无地无屋可栖止”(《张文襄公电稿》卷二十八, 第二十六页)。

宣统二年: 沙洋大堤冲溃, 被灾人民数十万, “所有受灾之区一片汪洋, 数里不见烟火。灾民有生食野兽之肉者, 有握泥果腹致毙者, 有掘树皮草根以济急者, 令人不忍目睹。”(《国风报》第二年第十二期, 《中国记事》)

以上仅举数例, 足以窥见一斑。由于连年水灾, 淹没田园, 冲毁房屋, 财产遭到洗劫, 成千上万的人求生无路, 只得背井离乡, 逃亡异地谋生。

天门籍华侨绝大多数出自天门东乡, 其重要原因即是东乡水灾特别频繁。这一带地势低下, “四望皆水”。人们为了安居, 只得高筑垸堤自保。可是, 堤垸经不住洪水反复冲击, 一

旦溃决，顿成泽国。人们艰苦创立的家业，立刻付诸流水。在旧社会，这里流行一首歌谣：“男子不愿在七十二垵托生，女子不愿在七十二垵嫁人。鱼行鸟窝，鸟无着落”！这首歌词，生动地反映了住在东乡七十二垵的人们，由于水灾而对这里产生的憎恶之情。他们正是为了逃避水灾，才忍痛向外移徙的。

据当地老归侨谈，那时外出逃荒，手里多要捧上一份“稟帖”，上面写着：

家居楚北，籍落天东（天门东乡），素习生理，初未离乎梓里，业勤耕织，岂甘唱夫泣歌！不料阳侯（按：古代传说中的波涛神）肆虐，洪水成灾，淹没田垵，损毁房屋。牲畜农具，平流殆尽。呜呼，千村那见烟火起，哀哉！四境不闻鸡犬声，欲生者十无八九，愿死者数以万计。民不得已，扶老携幼，糊口于四方；涉水登山，逃奔于贵境，恳乞贵县商店富户，热心长者，施怜悯之心，体好生之德，偿给口粮路费，以便前途逃生。卑民如有生之日，永感二天之德也。（据老归侨杨泽康口述）

这张稟帖，实际就是出国原因的写照。

天门县东乡出国华侨最集中之地是干一公社，这里正是水灾最多最重之地。据统计，全公社有华侨、外籍华人、归侨、侨眷、港台同胞共计 2,548 户，34,807 人，占了全县华侨一半以上。其中又以马湾附近的易家潭出国人数最多，几乎家家户户都出过国。易家潭是牛蹄河马湾垵堤多次溃口冲击而成的大水潭，地势最低，又界于牛蹄河与汉水之间，无论那条河溃口，这里都要遭殃。漫说汉水水大灾重，就是牛蹄河也象一条铁鞭，常把这里的人赶得流亡载道。老归侨说，易家潭由于常遭水灾，很早就有“养女莫嫁易家潭，家家户户卖假环”之谣。屡次遭受水害的易家潭，人们一贫如洗，无法谋生，只得出外流浪，靠卖假耳环过日子。易家潭因水灾最多最重，出国的人也最早最多，充分表明水灾是迫使天门人民纷纷侨迁国外的直接原因。

其次是人们无法忍受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的压迫，相继向国外移徙。在近代中国，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逼得天门人民流离四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乃是天门人民大量侨居国外的基本原因。

在天门，地主对佃农无不征收高额地租。有的地主把地租按货币折收时，又通过折价增加一层中间剥削。地主阶级的无情剥削，使广大农民无时无刻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成年累月在死亡线上挣扎。离干一镇不远的蒋家湖，过去经常闹水灾，加上地主的重利盘剥，许多贫苦农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只得纷纷外出谋生。光绪年间，生长在这里的蒋传银，只有开垦的几亩湖荒，一间难以遮雨的茅草棚，却有还不清的租债。光绪二十四年，又遇上大水灾，生活异常艰难，而催租逼债的却川流不息。那时蒋才 26 岁，逼得走投无门，只有带着弱妻幼子，靠打三棒鼓流浪到了印尼。这样的人，又何止蒋传银一个？！

地主的地租剥削之外，反动统治者的无止境搜刮，也是加在农民身上的一副重担。民国初年，军阀王占元统治湖北八年，每年平均搜刮达一千万元，“共计造出八千万元的资产”，在山东老家置买了亘达四县的土地①。吴佩孚、萧耀南在湖北搜刮财富，残害百姓，同样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任意抓丁派款，滥发钞票，使得天门和全省一样，无不深受其害。王占元统治时期，发行地方公债 200 万，到期本利分文不付；吴佩孚发行金库券 340 万，加印官票 500 万张②；汉口的中国、交通及中央三银行共发行钞票 8050 万，先后一律停止兑现③，全部变成废纸。由于滥发钞票，形成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湖北官钱局发行的官票清末每张折合银六钱多，1921 年王占元去鄂时犹值银三钱余，1926 年则“有一文不值之概矣”④！此外，他们为了筹集内战经费，又推行田赋预征。如 1924 年军署军事会议议决，强令湖北财政厅预征

1925、1926年两年地丁，勒令“限期征解，不得坐误军机”^⑤。这种预征制度，无异是对人民敲骨吸髓。

反动派的搜刮，不仅加重农民负担，而且促使天灾大大加剧。天灾往往和人祸分不开。近代天门水灾如此频繁，其重要原因就在反动派不顾人民死活，恣意侵吞修堤费用。长期以来，湖北为了防汛，用提成、附加、带征等方式，分别从各种税收中筹集修堤费用，“每年至少一千万元左右”。这笔巨款名义上为修堤专用，实际全归中饱。民国时期，除1928年曾用这笔款修过孙家拐堤防外，所有堤防和闸门皆未大修。而款项却以虚报工事费形式全被侵吞。“上自省主席，下至水利局之杂役”，无不从中分肥得利^⑥。正是由于堤防长年失修，才造成江河连年溃口，水灾频频不断。

和反动派加紧压榨同时，帝国主义对湖北的掠夺也日益加深。帝国主义凭借各种特权，在湖北开设工厂，推销商品，掠夺原料，迫使农民和手工业者成批破产失业。天门向来广种棉花，农村手工纺织业十分发达，“为农者家必兼织”，“农隙率妇子昼夜纺织，十室而九”^⑦。他们生产的土布，畅销邻近十多省。随着洋纱洋布畅销各地，土布被洋布代替，无形之中夺去了广大农民手工业者的生计。

农民在地主阶级剥削下早已喘不过气，再加上帝国主义掠夺，更感无法度日。他们为了寻求活路，不得不向外迁徙。易家潭的老归侨刘大为在天灾国难之际，为了躲避抓丁派款，新婚夫妇一气逃到汉口，接着又流浪到了广州。当时广州是洋人天下，乘车要让洋人，走路也要让洋人。在愤慨之余乃随着蜂涌般迁往国外的难民，挤上几乎沉没的难民船，站在水淹膝盖的船舱里飘流到了南洋。刘大为在回忆中感慨地说：“我们的祖国，当时就象这只风雨飘摇、几乎要沉没的大船一样？”象刘大为这样逃亡的，真是成千上万，无法统计。

战祸连年，希望有一个安定生活环境，也是导致大量出国的一个因素。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在一百多年中，外侮内争，接踵而起，弄得国无宁日，民无宁日。人们渴望安居乐业，为了求得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亦只好投奔国外，寻找栖身之所。

天门“为自古用兵之地”^⑧，自从清末以来，长期处于混乱之中。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以及各种土匪的骚扰，使得天门人民无法安定生活。人们愤慨地说：“水灾加兵荒，天灾人祸，真是祸不单行，福不双降。”比如1924年前后，水旱虫灾交替为患，土匪头子张西侯盘踞天门，他的老巢就在干一地区。这伙盗匪在天门到处杀人放火，抓丁抢粮，无恶不作。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八年艰苦抗战，人民更得不到安宁。这个时期土匪乘机蜂起，到处骚扰，弄得鸡犬难安。从1940到1945年，在长达六年的时间内，国民党师长王敬斋统率的一个旅驻扎在干一、田二河一带。旅长古鼎新扩充人马，自立山头，妄称一二八师，准备投靠日本，卖国求存。这时正是“七年淹六水”之后又逢连续几年大旱，古鼎新的强盗队伍不顾人民痛苦，肆意奸掳烧杀。干一地区被闹得乌烟瘴气，怨声载道。人们深恶痛绝地咒骂古鼎新：“天见古日月不明，地见古草木不生，人见古胆颤心惊，牲畜见古有死无生，树木见古拔土除根”。表明人们对军阀的憎恶已经达到了顶点。不少人就是在这种苦难境遇中逃亡出国的。甚至有些华侨回乡不久，见势不妙，又折身出国。

最后，天门人民所以能大量出国，还有一个特殊条件。长期以来，天门一带武术盛行，很多人学会一手好武艺，会玩各种花样武术，以后又从安徽凤阳人手中学会打三棒鼓、挑牙虫、扎纸花等技艺。这类技艺赚不了大钱，却可借此到处流浪谋生，为辗转流徙国外提供了便利条件。绝大多数天门籍华侨就是被天灾人祸逼得无法安身之际，依靠这些技艺，才得流落国外的。

总的说来，自然灾害，中外反动派的压迫，战乱匪患，是迫使天门人民出国的主要因素；玩武艺，挑牙虫等则是藉以出国谋生的重要手段。人们惯于安土重迁，没有天灾与人祸，决不会轻易离乡；然而没有这类谋生技艺，也很难在国外安身。无怪老归侨感慨地说：“如果不是天灾人祸，谁愿意流落异乡；如果没有这些谋生技艺，又怎能飘洋过海！”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也有一些次要因素。有的是亲帮邻带，乘老华侨返乡探亲跟随出国；有的是仰慕先期出国的在国外找到了活路，梦想到国外捞点钱财；还有一些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地主豪绅，于解放前夕逃亡港澳和台湾，然后转到其他国家。不过，即使如此，亦与当时社会环境，反动派的统治以及自然灾害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二 出 国 经 过

大约在十九世纪中叶，天门人民开始向国外移徙，起初以北上到俄国为多，后来主要南下东南亚，最后散居世界各地。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2年前，以北上俄国逃荒为主。大约一百四十年前，易家潭人易大排先以卖假环在国内逃荒，后来流浪到了俄国。从易大排开始，到1922年前，先后去俄国者约1,500人。这些天门儿女历尽千辛万苦，逃亡国外，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无法谋生，惟有靠玩把戏、卖纸花、挑牙虫、打三棒鼓等“讨米艺业”糊口。有的则持“稟帖”沿门乞讨。其间特别是干一镇人周树模从1908年署理黑龙江巡抚后，干一周围的人在连年灾荒、走投无门的情况下纷纷前往投奔，到达黑龙江后因为仍然找不到活路，又成群结队继续北上。在这前后，前往俄国的人不少。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给俄国人民带来无比深重的灾难。旅俄天门华侨同样深受其害。仅据归侨回忆，当时天门人因饥饿病死或食物中毒致死的就有23人。易双林一家5口，有4人因食物中毒丧命。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继十月革命后发生内战，接着遭到帝国主义的联合围剿。大战期间，被招募去俄国的华工，由于和当时劳动人民遭到同样命运，结成了患难与共的深厚情谊。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中，他们就开始一起战斗；十月革命后又积极加入红军。这批华工英勇善战，给白俄匪军以沉重打击。因此，白俄对华侨的报复更加猖狂。侨居乌克兰明里多普尼的天门华侨，一次就被杀害30多人。其中廖焕庭、杨宏元都是全家被杀。白匪屠刀下的幸存者张宗德、廖炳元都被白匪砍伤八九处，经过红军抢救，才得死而复生。

十月革命后，苏联因为严重战争创伤，人民生活异常艰苦，侨居苏联的华侨谋生更加困难。1200多名天门华侨，分别由陈在方、杨卓章办理“国际难民”手续，于1921—1922年免费遣送回国。剩下300多人，有的继续留在苏联，有的转徙瑞士、法国等地。他们到了这些地方，开始兼营小商生意。

1929—1933年间，世界发生空前经济危机，法国政府大批逮捕侨居法国的小商人。侨居欧洲各地的华侨生活十分困难。当时我国驻巴黎总领事馆工作人员陈里特，向驻法大使顾维钧建议，免费遣送他们回国。1932年，陈里特接受驻巴黎总领事馆的委托，负责护送天门华侨96人，从比利时盎维斯港乘德国货轮回国。

第二阶段：1923—1947年间大量流徙南洋。在这期间，军阀混战连年，天灾连续不断，天门人民在重重压迫下，有的为躲壮丁，跑兵荒；有的为谋生活，逃灾荒，纷纷避走他乡，先后出国的估计有一万一千多人。

早在第一阶段，已有少量天门人去南洋。据蒋家湖侨眷蒋梅开说，少时曾听到祖父蒋传银说过，1898年他流落到印尼泗水一带，就在那里遇见过不少易家潭人。许多老归侨都说，最先去俄国的易大排，从俄回国后做了一栋新房，接着又出国到南洋去了。干一公社老归侨魏登州于1918年到印尼时，也在那里遇见了出国比他早的同乡易修坤、杨志春、黄泽宏等人。易杨靠打三棒鼓、持稟帖要饭去印尼，黄则是靠玩把戏、卖膏药辗转到了那里。后来易修坤跟广西华侨金克霞学会镶牙，杨志春等也想学习，可是易修坤拒绝传授。杨志春非常气愤，不惜花费巨金，找到另外一个广西籍镶牙华侨，终于学会了镶牙。杨志春不满易修坤的保守，凡属天门同乡，只要想学镶牙，他都热心教导。从此，镶牙手艺在天门籍华侨中得到广泛传播，至今旅居世界各地的天门籍华人，多半仍以镶牙为业。

天门籍华侨学会镶牙，开辟了新的生活门路，在南洋的景况多比俄国强。从苏联遣送回国的华侨，回到天门即碰上连续六年的水旱虫灾，天门饿殍遍地，逃荒者络绎不绝，加上张西侯为非作恶，实在无法，又串联亲友出走南洋各地。此后，继1931年的特大洪水，随之而来的是七年淹六水的罕见水患。加上大革命、土地革命相继失败，革命人民遭到血腥屠杀。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抓丁拉伕，派粮索款，人们不堪其扰。于是，为了逃灾荒、躲壮丁、避屠杀，出国者川流不息。

郭咀八十岁老归侨彭之斌，十岁曾随父亲到过俄国，回来后开药铺行医，虽属小康之家，由于张西侯抢劫了干一镇，又冲到郭咀掳掠，乃约集五户乡邻结队出国，流落印尼四十年，直到1965年才回归故里。

1931年，天门来了红军，参加红军和农会的人风起云涌，各地纷纷建立乡村苏维埃政权。后来，由于国民党的无情镇压，许多人受到迫害。干一当时属马湾区，伪区长陈望林大肆搜捕清乡，几天之内就杀害革命群众达三百多名。刽子手将苏维埃主席马望庭活活剖腹，取出心肝下酒。他的儿子闻耗逃出虎口，由叔祖父掩护赴沪和侨居印尼的姑父接到印尼，才得幸免于难。老归侨蒋仲成参加红军，战斗中负了重伤，靠亲友掩护脱险，逃居印尼。据粗略统计，干一周围为此避难出国者共有130多户。

马来西亚归侨石青云，生于1903年，12岁跟随姨父的马戏团到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地，依靠卖艺为生，兼熬跌打损伤膏药，五年后返乡。24岁又随妹丈蒋鹏昌到越南，靠镶牙糊口。28岁归国探亲，旋即将其弟石春羊和内弟卢承香两家带往越南，均从事镶牙。29岁因病一度返回上海，病愈后又去香港、山打根、沙捞越和文莱等地，30岁遂在沙捞越的米里定居下来，以镶牙为业，兼营钟表生意。

第三阶段：1948年后，部分伪职军政人员和地主资本家潜逃港、澳、台湾，然后转徙出国。解放前后，部分天门籍国民党军政人员，城市资本家和农村豪绅，有的属于畏罪潜逃，有的是受骗上当，盲从出走，前后出走的约千多人。其中一部分定居港澳台，一部分转到南亚、美、欧等地。现今侨居泰国的廖华平，原系国民党某师军需官，解放前夕去台湾，以后迁居泰国，1979年开采钨矿成功，在泰国华人中颇孚众望。

三 天门华侨在国外

天门籍华人开初主要居住在东南亚，经过一百多年的搬迁，加之1960年至1965年印尼政府两次大排华、1979年越南当局疯狂迫害华侨，天门籍华侨被迫转徙各地。现在天门籍华侨和外籍华人分布于印尼等36个国家，足迹几乎及于全世界，特列表如下(单位人)：

印度尼西亚	19,542	巴基斯坦	492	苏联	329	荷兰	265
印度	3,717	斯里兰卡	258	英国	227	法国	197
柬埔寨	1,475	老挝	192	巴西	164	西德	148
越南	6,499	加拿大	113	瑞士	110	澳大利亚	110
泰国	3,652	文莱	81	意大利	60	墨西哥	56
新加坡	1,228	日本	43	朝鲜	42	葡萄牙	40
马来西亚	4,778	肯尼亚	35	罗马尼亚	31	孟加拉	28
缅甸	2,539	土耳其	28	古巴	25	埃及	25
美国	895	西班牙	19	菲律宾	14	危地马拉	5

散居各地的天门籍华侨和华人，90%以上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从事辛勤的劳动，与当地人民一起，对侨居地区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天门华侨以侨居东南亚最多，他们大多从事镶牙，给侨居国人民解除了很大痛苦。东南亚人民喜爱吃糖，所以牙病普遍。自从天门华侨在各地兴办牙科艺业以后，给他们清洁牙床，拔去坏牙，装上假牙，不同程度地给他们解除了痛苦，保护了他们的健康，由此与当地人民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据归侨谈，1959年印尼颁布排华法令，从事牙科艺业者不在“禁令”之内，足见牙科艺业，对当地人民十分需要。

其次，散居各地的天门华人，广泛经营商业和开设服务行业，促进了当地城乡经济的交流和发展。在东南亚各地，不少人开设钟表、眼镜、布匹、家庭电器等商店，有的经营土产，还有的办水厂、米厂、汽车电器修配厂和卷烟厂等；在欧洲各地，则以开设饭店、酒楼而负盛名，也有经营洗衣店的。这些与当地人民密切相关的行业，对满足当地人民需要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第三、侨居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西等地的华侨，有些开垦荒地，种植各种经济作物。这些国家不少的胡椒园、橡胶园、丁香园、瓜果蔬菜园等等，无处不有他们辛勤垦植流下的汗水。

第四、对侨居地的工业建设也作出了贡献。除上面提到的廖华平开采钨矿外，侨居印尼的汪云彩，从事轮船运输事业，来往于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间，对便利这一地区的友好往来，促进经济文化交流，都起了重大作用。

第五，他们对其后辈注意培养深造，为当地提供了各种科技建设人才。现在天门籍旅居世界的华人，经过教育培养，不少成了当地从事各方面建设和科学教育的专门人才。比较著名的有美国医学博士卢业兹、日本医学博士萧怡群、美国经济博士吴志炎、泰国建设工程师石宪邦、法国高能物理博士余良弟、美国著名土木工程师周世文等二百多名。这些学者专家对侨居国文化科学事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都曾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还必须提到，侨居各殖民地的天门华人，同时积极参加了当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例如居住在印尼的天门人，在反帝反殖斗争中，他们始终和印尼人民在一起战斗，结成了深厚的战斗情谊。20世纪30年代，荷兰殖民者血腥镇压抗荷斗争，造成“红河惨案”。在这次事件中，印尼人有重大伤亡，华侨也伤亡达数千人。

华侨用血汗和生命对侨居地作出重大的贡献，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却遭到殖民者与当

地反动统治者的野蛮迫害和苛重剥削：

在荷兰统治下的印尼，地方当局对华侨的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华侨进入印尼，登岸要缴海关税，居留要收人头税，谋生要纳营业税。此外，生要税，死要税，读书也要税。归侨石么英说：她在印尼时期，每人缴人头税大人是500盾，小孩300盾。她是双重国籍，要上中文学校读书，先得交税500盾，才能取证入学。

种族歧视常常使华侨受到难堪的凌辱。印尼当局禁止华侨在路旁开设食品店，禁止随意旅行各村落，并且禁止无业华侨居留。如果犯禁，不是遣返回国，即被放逐。

华侨不仅在社会上受歧视，在法律面前也不平等。如在荷兰殖民者统治时期的印尼，华人遇有诉讼事件，“审费照西人至多之例核算，科罪又照土番至重之例办理。纵令理可得直，而追回银数，往往不敷状师之费。因此含冤负屈者不可胜计”^⑩。

从鸦片战争到解放前夕，天门籍华侨在国内受尽压迫和痛苦，被迫流亡异域，盼望找到一席安身之地；可是到了国外，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依然未曾摆脱贫困的命运，并且由于旧中国历届反动政府极端腐败无能而连带蒙受凌辱。回顾这段辛酸痛史，使他们深切地感到：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华侨将永远摆脱不了受歧视、受欺凌的命运。他们怀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希望，在中国近代历次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无不竭力支援，有的还为革命贡献了宝贵的生命，为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广大华侨激动得热泪盈眶，纵情欢呼：“中国解放东方亮，海外孤儿有了娘。”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华侨的地位得到了改善，摆脱了“海外孤儿”的命运。很多天门籍华侨，怀着崇高的爱国热情，纷纷回国学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谱写了光辉的新篇章。解放以来，天门归侨出席全国、省、县各级先进表彰会的就达43人。省劳动模范、天门十标兵之一，农机厂工人郑洪发，出生在印尼，1954年十三岁时回国，立志为祖国建设事业献身。他诚诚恳恳，几十年如一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更是心往四化想，劲往四化使，坚定地表示：“为了祖国早日四化，我要豁出命来干”。1980年夏天，厂领导要他负责安装缝纫机车间。他连续90天没有休息。厂里按规定发给十三个假日补助费，他一文也不要。缝纫机投产后，机壳每天只能生产40台，厂里调他去负责生产，日产很快提高到240台。厂里要他带徒传艺，他教导徒弟首先要爱厂如爱家，学会如何做主人翁。徒弟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成长很快。人人称赞他是“归侨的楷模”。

自从粉碎“四人帮”以来，党的侨务政策重新得到贯彻，广大华侨深受鼓舞，更激起了他们爱国爱乡、为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的热情。不少人纷纷回国观光探亲，和家乡通信更是往来不绝。从1977到1982年，回乡探亲的达394人次。他们久居国外，现在虽已多数加入侨居国国籍，但爱国之心并未稍衰。有一华人，1936年出生天门，1942年出国，去年4月专程回乡“寻根”。他说：“我们在国外，国籍可以改变，但热爱祖国之心永远不会变”。离乡时他特意包了家门口一块土带去，用以教育后代永远不忘故土。有些回乡探亲华侨，出于爱国爱乡之心，还主动捐款赠物，支援家乡建设与各项福利事业。据统计，这几年捐赠钱物折合人民币达76,000元，为其亲属、汇款达1,077,000元。侨居印尼的黄春生，五十年代捐款12,000元为家乡办了一所小学，又捐款5,000元修了一座桥。1979年再次回国，复捐款15,000元，把小学扩建为中学，后再捐了7,000元为学校添置设备，这所华侨中学于1980年建成，使周围380名学生得在校接受教育，为培养四化建设人才贡献了力量。美籍华人、药物高级研究员卢业兹，1979年当他姐姐出国探亲时，他把花费18年心血积累的《药物代谢》资料托她带回相赠。1981年，他乘出席日本药物会议之便回国，

（下转第29页）

向美国，在一定的时间内和一定的程度上可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的状况。然而由于美元对他国货币的汇价提高，一方面使美国出口商品价格上涨，美国商品在国外市场上竞争能力削弱，导致出口萎缩；另一方面使进口商品价格下跌，外国商品在美国国内市场的竞争能力加强，导致进口的增加。这样，外贸逆差将会扩大，国际收支状况将随之恶化。

综上所述，对美国国际收支的前景，不能作乐观估计，它仍将陷入深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这也就从一个侧面证明着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论断的正确性。

注释：

①③④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情况》(统计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第58、497、497、505、617页。

②⑩⑫ [美]《总统经济报告》1981年，第117、69、189页。

⑥ 根据[美]《现代商业概览》1980年3月号，1981年3月号计算。

⑦⑧ [美]《基本经济统计手册》1980年9月，1982年1月。

⑨ [苏]《国际生活》1980年第10期，第103页。

⑪ [美]《商业周刊》1978年第18页。

⑬ [苏]《苏联财政》1981年第1期，第76页。

⑭ [美]《联邦储备公报》1972年4月，[美]《总统经济报告》1971年2月，[美]《现代商业概览》1971年11月，1981年11月。

⑮ J·M·斯托普福德等著：《世界多国企业指南》1980年英文版，《导言》。

⑯ [美]《挑战》1981年3—4月号，第43页。

⑰ [美]《1982年预算修订》1981年3月，第98—99页。

.....

(上接第46页)

又到京沪武汉等地进行义务讲学，还把随带的药物研究幻灯片交武汉医学院复制，既丰富了我国的药物资料，对于中美科技资料交流也是一个推进。

注释：

①③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20，529页。

②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391页。

④ 《银行周报》第十卷第20号。

⑤ 若愚：《吴佩孚铁蹄下之湖北》，《响导周报》第92期。

⑥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第126—127页。

⑦ 道光《天门县志》卷九。

⑧ 道光《天门县志》兵志。

⑨ 《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811页。